

# 永懷 蔣公

上官業佑

## 廬山晉謁恭聆訓示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秋，我考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，俸列最高領袖校長 蔣公門牆，接受革命洗禮。民國廿一年，我由黨校改制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第一期畢業，分派到浙江省政府民政廳工作，為時一年，承康澤先生的推介，（康先生，字兆民，四川人，在大陸歷任黨政軍要職，深得 領袖信任，最後出任襄樊綏靖區司令官，苦守危城，自殺不死被俘，始終持節不屈，為共匪折磨致死，曾蒙 領袖公開褒揚，譽為軍人典型。）並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電浙省主席魯滌平先生調往江西參加剿匪工作（當時在浙省服務的政校同學共選調八人）。我被派赴江西省星子縣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擔任訓育組組長。參加受訓的學員，分為兩類（召集教育：甄選陸軍官校各期畢業生施以短期的訓練。（二）養成教育：招考高中暨大專畢業生施以較長時間的教育。學員畢業後均編組為軍委會別動總隊，擔任清剿共匪、組訓民衆及宣撫綏靖等工作。當時我年僅廿三歲，我懷着臨深履薄的心情，來

主持全班的訓育事宜。在這一段時期，領袖經常駐節廬山，督訓剿匪幹部。某日，他親臨星子特訓班，個別傳見大隊長及組長以上的主管人員。我晉謁時，他曾訓示我說：「你是政治學校畢業生，為什麼要調到軍校服務呢？須知剿匪是三分軍事、七分政治，所以調你來參加剿匪工作。」這是我第一次單獨晉謁 領袖，他留給我的印象是：諄諄善誨如良師，和藹可親若慈父，令人肅然起敬，欣然景從。這一次晉見 領袖，是我生命過程中轉捩點，因為從此時開始，我便直接從事刻苦耐勞冒險犯難的剿匪和抗戰的艱鉅任務，而無法像一般政校畢業同學大都去參加地方行政工作。中央軍校特訓班，特重思想教育與精神訓練，不分官生，大家都是腳穿草鞋、腰繫皮帶，幕天席地，住宿帳篷，過着相當艱苦的生活。在星子那一段時期，我們經常有機會恭聆 領袖的訓示，領袖有時駐節海會寺的黑色小木屋裏，飲食起居及衣着等，與一般員生完全相同，其平日生活之儉樸，於此可見。

## 西安事變同困危城

二十五年西安事變時，我任軍委會別動隊指導主任，駐防陝南商縣，對共匪實施宣撫清剿工作。時 領袖駐節臨潼，督剿殘匪。當時共匪已為國軍逼困於陝北延安一隅，成為甕中之鼯，指日即可完全殲滅。共匪見情勢危殆，乃施其一貫統戰鬼域伎倆，利用東北軍的思鄉情緒，趁機煽惑張學良和楊虎城叛亂。事變前夕（十二月十一日），我適在臨潼行館委員長侍從秘書肅乃華學長處，（政校一期同學，在此次變亂中殉職），有事洽商，曾親見張學良着黑色絲棉袍來晉謁 領袖，談話聲音，忽高忽低，爭論很久，黃昏時，張始快快而去。事後，獲知張學良竟要求停止剿匪，先行抗日，遭受 領袖嚴詞訓誡，不料翌晨即發生舉世震驚之西安事變，我也被困於危城之中。別動總隊早已有張、楊不穩定的情報呈報上級，但未料其竟敢採取如此大逆不道的規矩領袖手段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。事變中張學良檢讀 領袖日記，深為 領袖謀國的忠誠，與對其個人的提攜愛護的恩德所感動，乃憬然悔悟此舉之鑄成大錯，乃親自護送 領袖飛回洛陽。此次事變中，領袖所表現的偉大人格，與凜然不可

犯的浩然正氣，更贏得了全民一致的衷誠愛戴和擁護，無形中也增強了日後全民抗戰的精神團結力量。不過，倘無張、楊此次之叛變，則今日，共匪決不可能竊據大陸，奴役我大陸同胞，毀滅我中華文化。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、民族的命運，影響實在太深遠了。當時外間誤認別動總隊為藍衣社，共匪尤視為眼中之釘，指名搜捕別動總隊重要幹部。我因得好友掩護，九死一生，倖免

於難，遂於十二月廿五日與 領袖同日脫險。二十六年「七七」、抗日聖戰爆發後，我即投入抗戰的陣營，從事敵前作戰與敵後游擊工作，縱橫活躍於大洪山、大別山一帶，雖冒險犯難，艱苦備嘗，但因受 領袖西安事變之偉大精神感召，一切甘之如飴，視死如歸，從無畏縮反顧的心理。

### 曲原部屬胸懷廣闊

第五戰區區長官部設

在老河口，李宗仁以司令長官身份召開軍事會議。其時我任廿九集團軍四十四軍政治部主任，因軍隊防區屬第五戰區，曾參加此次會議。總司令王縱緒是四川人，所部紀律較為廢弛，有兩桿槍之譏；一桿步槍，一桿煙槍，因此戰鬥力不强。會議後 領袖傳見，我將部隊實情毫無保留的提出報告。

領袖勉勵我一定要堅定容忍，協和人事；並指示：「這種部隊能出川抗戰，就不錯了，不能拿同一的尺度和要求來衡量他們……」。王縱緒當時是辭去四川省

主席，調任廿九集團軍總司令帶領部隊，出川抗戰。領袖所期望的是全民一致團結共赴國難，並不計較這些非一朝一夕就可改進的積弊。由此我們可以窺見 領袖對部屬的曲原和關愛，及凡事都朝大處着想的開闊胸襟。

### 青年從軍一則軼事

民國三十二年，我在重慶復興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二期受訓後，奉調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主任組織處處長（處長係康澤先生）。因職務關係，常到 團長官邸（當時 領袖任團長）參加會報和中央幹事會議，聆訓的機會更多。三十二年冬天，抗戰進入艱苦的階段，青年團奉團長指示，發動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，我和團部的幾位同志，率先報名參加。此次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極為成功，不到兩個月，僅四川一省報名參加的人數，即達兩萬餘人之多，全國青年在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偉大號召下，莫不爭先恐後，如火如荼的踴躍報名參加，掀起從軍報國的高潮。到次年便超過十二萬人，抗戰時期，從軍青年所表現的愛國熱忱，實在彌足感人！我們青年團的幾位同志雖然率先報名參加，但却沒有如願，因為 團長曉諭我們：「你們能發動青年從軍，完成了徵召任務，黨團領導幹部，不必都親自從軍，因為發動工作尤為重要。」當時，我個人報名從軍是純憑着滿腔熱血，希望回到前線，直接參加與敵人的最後搏鬥，而領袖則衡量全局，勉安現職。我乃服從指示仍留在原來的崗位上工作。



蔣介石早年召見本文作者並賜合影留念。

### 遠戍西北獎勵有加

新疆自二十二年四月間，蘇俄策動盛世才政變後，即脫離中央，轉受蘇俄之控制。二十四年八月，共匪從川北向西北流竄時，他原來的目的地為新疆，企圖在此取得蘇俄的直接支援。但因在陝甘邊境被國軍中途阻截，才轉往陝北依附土共，苟安一時。至三十一年四月間，蘇俄更企圖推翻盛世才，來建立其蘇維埃的傀儡政權。是年八月，領袖巡視西北陝、甘、寧、青各省，經對盛曉以大義後，盛乃決定服從領袖，歸順中央。

新疆雖然歸順了，但蘇俄對新疆的侵略企圖，並未因此打消，仍策動成立所謂「東土耳其斯



張治中

且共和國」。在延安的毛匪，也妄圖攻佔陝甘，據有新疆，以便與蘇俄取得直接聯絡。因此，西北在國防上的地位益形重要。政府為鞏固西北的國防，及加強西北的建設，乃改第八戰區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，任命張治中為軍政長官，統轄陝、甘、青、寧、新等五省軍政事宜。

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之後，我奉派前往服務，先後曾充任政務、新聞、民事、政工等處處長職務，主管地方民事與軍中政訓等工作。在我服務的這一段時間裏，我的足跡走遍了西北邊陲，使我深深認識到西北土地的遼闊、資源的豐富，以及在國防上的價值。

張治中於三十八年和談時，變節投匪，但其在蘭州時，就早已顯露了投機取巧的痕跡。我可舉些事例作為佐證：當共匪攻佔西安進取蘭州時，某日，周匪恩來在延安指名對張治中廣播，一再重複地說：

實報告。從張治中的重視此事，可以想見其別具用心，他日後的媚共投匪行為，絕非偶然。又有一次，張治中召集蘭州各界講話，竟公開說：「實行三民主義雖是國民黨的事，但國民黨二十餘年來，並沒有實行三民主義，現在只要誰能實行三民主義都成。」他又發謬論說：「共產黨要解放我們，其實我們自己可以解放自己；譬如身穿棉袍，天熱自己脫掉好了，何必要人家動手？」這種謬論，其實身投靠之用心，實已昭然若揭。是年初，我飛往南京開會，因發現張治中對剿匪的意志早已動搖，乃於晉謁領袖時，據實報告。他老人家面色凝重，未置可否，只簡單嘉勉我兩句話：「你很努力，你很盡責！」我們不難想見領袖當時心情，是如何的沉痛。此次晉謁，我厚蒙獎勵，內心至為感動，決益矢志貞，以報答領袖的厚愛。

### 酒泉危城電話對答

「文白兄（張治中別號），我們假道蘭州，是為了來消滅西北馬家的封建勢力，並不侵犯文白兄的防地。」（當時馬步芳為青海省主席，馬鴻逵為寧夏省主席。）我收到廣播後，秘而不宣，因恐影響其不穩定的剿匪情緒。迨張治中從蘭州中央社分社某記者處，獲悉此一廣播後，即召我詢問有何消息？我仍隱匿不告，他乃提出周恩來廣播之事見詢，我始告以此是共匪統戰陰謀，不值得重視，是以未予稟報。張囑：以後任何情況，均應從

我於開會後，很快就飛返蘭州。卅八年一月，李宗仁代理總統職權後，立即與共匪進行和談。張治中此時，則以和談代表身份，與邵力子等留在南京，等待與共匪和談。四月二十日，和談破裂後，共匪即大舉進犯西安，五月底西安撤退後，任馬步芳為西北軍政長官，但因西北各省的軍政首長，未能協同禦匪，七月底，匪軍二十餘萬，即侵入甘肅。八月中旬，蘭州已告緊急，守軍馬繼援部，經二十餘日的浴血苦戰，不支撤退，雙方傷亡慘重，我軍輾轉撤到河西走廊。中央當時，曾擬將戍守新疆的大軍撤出應援，但以路

民國三十七年任襄樊綏靖區司令官苦守危城自殺不死被俘，持節不屈，為毛共折磨致死的康澤將軍。

途遙遠，交通不便，卒致遲疑未決。陶峙岳時任新疆警備總司令，只求苟安自保。於是，新疆處於孤懸塞外進退兩難的狀態。蘭州陷後，我和當時西北副長官劉任將軍（劉將軍係國大代表，退役後任東吳大學教授。）率領殘部，於倉卒間撤抵酒泉，共匪又兵臨城下。匪僞前敵指揮官王震，是湖南人，他的參謀長劉振世，是湖南湘西人，我在中訓團高級班第二期受訓時，劉任隊長，後轉任劉戡軍團參謀長，劉戡係湖南桃源人，在陝北剿匪失利自戕，而劉振世則被俘後投靠共匪。當時王震因我也是湖南人，會親筆寫信，以同鄉之誼來勸誘，說什麼西北是湖南人打來的天下，從左宗棠起，湖南人對西北就大有貢獻云云。信中王匪又會轉述毛匪的話說：過去湖南人盡為別人流血流汗，今天湖南人自己出頭了，希望我回歸到湖南人自己的陣營去。這一派胡言，完全是敵僞的統戰詭計，我是絕對不會上當的。因為我深知與共匪鬥爭是沒有中間路線的，他們主張「不是同志，就是敵人」，中途變節投靠，決沒有生存的餘地。但是，西北將領中，有不少短視無知的湖南人，仍然上了共匪統戰的圈套，而甘心投匪。我於開會時，曉以大義，動以利害，苦心勸阻，甚至發生劇烈衝突，亦於事無補。

西北局勢危疑震撼，酒泉四面受敵。副長官劉任將軍，在黑夜大雨中撤退時，因車禍負傷，軍心動搖，大局危殆，時 領袖坐鎮重慶，我設法打通了無線電話，先由經國先生接聽後，命我直接向 領袖報告所處困境。當我聽到 領袖和藹聲音的時候，就好像在遠方受難的遊子，投到

了慈父的懷抱，得到了無比的溫和慰藉，也使我莫名的感奮。「我是委員長，上官同志嗎？我能收聽你的電話，敵人也能收到。」他老人家首先提醒我的警覺，我簡單陳述當時情況後， 領袖馬上指示我兩點：「一、立刻打有線電報來；二、我立刻派專機送親筆信給西北將領。」 領袖的睿智英明與決策果斷，我們可於此事中窺見一二。

### 指派專機接運脫險

共匪已經包圍酒泉，飛機場外也被佔領一半。有少數忠貞人士為脫離共匪魔掌，已取道新疆而去印度；也有一部分人則在作賣身投靠的打算。酒泉危在旦夕，人心惶惶，我和劉將軍，正作

由南疆繞西藏脫險的打算。在絕望中，機場上忽然降落一架軍用飛機，是空軍西北軍區情報處處長王殿弼中校親自駕駛的（王處長來臺後，曾任空軍幼校少將校長，現已退役，旅居加拿大。）攜有 領袖指示機宜的親筆信，及由成都發出的電報； 領袖在電報中飭令：「大勢如不可為，即刻飛離。」我奉到 領袖指示後，馬上打長途電話給新疆警備總司令部陶峙岳，探問那邊情形

他說：「新疆部隊撤不能撤，戰不能戰。」他反問我：「為保全十萬官兵安全，如何自處？」並說：「我所部將領主戰主和，意見不一致。」要我謁見 領袖時，代他報告他的處境困難，並給他指示。可見陶此時的立場，業已動搖，與做人處事的圓滑（新疆後於九月二十六日，由省主席鮑爾漢與陶峙岳通電附匪）。

新疆局勢已不可為，河西部隊，又如鳥獸潰散，酒泉處在共匪重圍之中，實無法支撐殘局，於是我只得陪同負傷的劉任將軍暨其夫人，乘王處長那架小飛機，於淒風苦雨的黑夜中，冒死離去。回首西北大好河山，已淪於魔掌，傷心欲絕。從酒泉飛成都，天候惡劣，汽油耗盡，飛機又壞了一個引擎，俯衝而下，幸未肇禍。到成都後，立即馳往陸軍官校晉謁 領袖，官校留話，命我們趕往重慶。但此時重慶情況，又告緊急，無法成行。從我這一次脫離共匪魔掌的經過情形，我們不難想見 領袖平日是何等的關愛他的學生，和取信於他的部屬啊！

### 陽明山上兩度傳見

三十八年十月，我輾轉經廣州、海南島來到臺灣，當時 領袖尚未復行視事，蒙他老人家在草山（現更名陽明山）官邸接見，垂詢西北情形達一小時之久，並命我分析張治中變節投匪經過，我不禁感傷落淚！ 領袖頻頻慰勉，並留我單獨共進晚餐。我身著棉布軍服，孑然一身，別無所有。次日即有人送新臺幣兩萬元到中國之友社（即現在人事行政局所在地），囑我添製衣物，並接眷來臺。事後始知是官邸俞濟時將軍奉命行事。 領袖對我個人如此垂愛，真使我感激涕零，而不知如何報此恩德！

隔了幾天， 領袖再度傳見，同時晉謁的，尚有西北副長官劉任將軍，前新疆省主席吳禮卿先生（忠信）和甘肅籍的黨國元老田崑山先生（吳田兩先生已去世）。 領袖非常關注新疆情形

和西北問題，談了很久，又留大家晚餐。領袖告訴我，閻錫山先生已組織戰鬥內閣，命我和鄧雪冰（文儀）先生回到重慶，組織國軍總政治部。但等到我第二次由臺灣返抵成都時，重慶已呈混亂局面，中央政府又遷往廣州，此事遂告擱置。我一家人散居長沙、成都等地，兵荒馬亂，交通梗阻，以致父母未能撤離大陸，使爲人子者抱恨終天！尤其大陸淪陷，自己未能以身殉職，頹顏苟活，愧咎殊深！故重到臺灣，暫寄居舊友吳思行兄（曾任省黨部書記長）家時，只閉門思過，與外界鮮有接觸。

### 流亡青年獲得安置

三十八年大陸撤退時，流亡來臺的青年學生約二千人，麇集在臺北市七洋大樓（原在火車站附近，現已拆除改建），衣食沒有着落，讀書沒有學校，當時曾醞釀成立革命大學，行動難免越軌。嗣政府決定籌設臺灣省青年服務團，準備收訓會在大專學校肄業的流亡學生。某日，當時任省教育廳廳長的陳雪屏先生突然造訪，陳先生開門見山的就說「有一樁事情，我曾與經國先生商議，由你來擔任，最爲適當。」但提出來只能接受，不能拒絕；他所指的就是上述青年服務團團長這一職務。陳先生又說此項決定，並非他個人的意見，曾經黨政有關方面協商，認爲我曾從事青年組訓與軍隊政訓工作很久，「經驗豐富，不容推卸。」我固辭不獲，乃勉爲同意。不久，臺灣省青年服務團，就在筆路藍縷中成立了，原住

在七洋大樓的兩千大陸流亡青年，至此在生活上才獲得安定，在精神上才有所寄託，在學業方面也才得以繼續。

領袖非常重視這一批大陸流亡來臺青年的安置和教育訓練。他老人家經我恭請，曾蒞臨大直團本部，給他們訓話，勉以青年治學爲人與處世之道。緣青年服務團成立時，其團址在圓山動物園附近（即後來的美軍顧問團所在地），房舍簡陋，也無任何教育設備，當時學生，都是坐在小板凳上，手持圖板，集中上課，其窘況可見。後來美軍顧問團第一任團長蔡斯將軍看中此地希望服務團遷讓，作爲顧問團的團址，蒙領袖批交省府撥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，作爲搬遷費，同時美軍顧問團，也送了十棟活動房屋作爲宿舍，於是服務團就遷往大直，重建團址（即現在大直國中所在地）。

青年服務團團址遷往大直時，原先擬定的範圍，是自山麓到基隆河邊，其中有民地，也有軍用地。陸軍大學（以後的三軍聯大）當時也正籌建校址。某日，領袖親自查勘陸大建校地點時，曾傳見我面諭：「你要這樣大的地方做什麼？服務團重要，陸大也重要；我看馬路東邊給陸大，靠河邊的歸你們好了。」我奉領袖指示後，立即遵照辦理。

自三十八年底到四十一年這一段時間裏，我把全部精神都貫注在青年服務團的這幾千流亡學生身上，凡事以身作則，與教職員生共同生活，共同學習。後來，他們都有所造就，對國家社會頗多貢獻，沒有辜負領袖對他們的訓勉。

### 關心鼻疾厚賜旅費

民國四十一年，我奉派任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，那時省黨部還在臺北市南陽街，每次召開全省代表大會，都恭請領袖親自蒞臨訓話，全體黨員感到莫大的光榮。我到省黨部後，發覺基層組織不够健全，地方門戶之見甚深。於是，決定了幾項工作重點：（一）消化地方派系；（二）健全基層組織；（三）建立地方自治選舉的提名制度。不過，在服務省黨部的那一段時間，我雖然抱着戒慎恐懼的心情，勉力從事，惟地方黨務工作至爲繁雜，仍慚建樹無多。三年後，奉調中央黨部第五組主任，因之沐受總裁耳提面命的機會也較多。民國四十五年，奉派赴土耳其、西班牙等國考察青年運動；同行者有當時任救國團副團長的鄧傳楷先生（現任考試院銓敘部部長）、救國團組長包遵彭先生（已去世）、尚在臺大肄業的錢復先生（現任外交部政務次長）及反共義士數人。

我因患過敏性鼻炎，常感不適。出國前，向領袖辭行時，他老人家很關切垂詢我鼻疾的情形，我報告曾在國內開刀兩次，沒有醫好。領袖即親切叮囑我趁出國之便，把鼻病診好。等到兩個月後，從歐美回來復命，領袖又問起，我的鼻疾醫好沒有？我據實回答：時間太短，病因複雜，開刀無把握，恐怕貽誤工作，所以並未就醫就回來了。領袖對於部屬這樣慈愛，這樣關懷，怎能不令人永銘心版！

在中央黨部服務五年期間，由於列席中常會的關係，常可見到我們英明的領袖，敬聆他的

訓誨。薰陶日久，進益甚多，四十七年，我再度奉派回省黨部工作時，我曾恭請 領袖另行考慮人選，我的理由是當時只有這個唯一的省黨部，比我適任的同志很多。 總裁諭示：「你過去做得很好，還是你去。」我惶恐之餘，惟有敬謹受命，重作馮婦。四十九年，應美國國務院之邀，赴美訪問，行前，晉謁 領袖請訓，並表示希望便道考察歐洲各國黨政。他問到費用一項，我答以美國所供給的往返飛機票是頭等，打算改換二等票，大概就可够用了。 領袖當即命我：「不要改，改了有失體面，錢不夠，我補助。」

領袖這一次，厚賜了我三千美金，使我的美國之行，大為壯色。回國後我因為 總裁補助的旅費尚餘一千元，乃繳還中央，當時充任中央財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徐柏園先生說：「你是三代以下第一人，因為我理財務很久還沒有看見錢多了又退回的。」總裁對部屬的垂愛和體貼，真可說無微不至，我們作部屬的，豈能不由衷感奮而思有以報効？

## 地方選舉幾件要事

我第一次在省黨部主任委員任內，因為基層組織既無專人，又無經費，於是，徵調曾在大陸任黨政軍工作的高級幹部，充任區黨部常務委員，為黨義務服務。如臺北市大安區黨部。我乃邀曹日暉同志出任常委。（曹同志，湖南人，軍校第一期畢業，曾任集團軍總司令，現已去世。）後來我視察黨務時，察覺曹同志不辭勞怨，不計

待遇，不眠不休，推展工作，我乃調升為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，為時不久，因臺北市市長選舉失敗去職。中央常會檢討此事時，我已調職中央，領袖詢問「曹日暉係何人所薦？為何薦用此人？」我答以「我素不識其人，因察覺其人計以往的地位，不計目前的待遇，獻身基層工作，是以提薦其充任市黨部主委。」 領袖謂：「我瞭解曹同志比你深，他帶兵作戰，是其所長，但黨務工作，是其所短，事先為何不向我稟報？」我答以：「此事乃省黨部主委的權責，為幹部者凡事應替 領袖分憂分勞，不宜遇事請示，放棄自己的責任。」 領袖乃首肯不究。由此，我們知道領袖處事是最講原則的，最明是非的，只要你能負責盡職，即令有些錯失，他也會原諒而不計較的。自此以後，我遇事堅守原則，勇於任事，既不擅權，亦不卸責。但此種作風，惟有 領袖智睿，可以支持信任，却往往招致他人的批評和不满，使我在工作崗位上，常萌求去之心，而無所留戀。

我在省黨部第二任期間，對於地方選舉提名問題，本着一秉至公至誠，無我無私的精神和原則來辦理的；其間雖曾遭遇到很多困難問題，但都蒙 領袖的審裁而獲致解決，使我在工作的推行上，得到很大的鼓勵和幫助。例如：（一）臺北市市長人選，我提薦某同志競選連任，可是有些黨內同志，却持不同意見。當時，我在國防研究院第三期受訓，晉謁 領袖，報告臺北市市長提名人選問題，我說：「違法而不舞弊」和「舞弊而不違法」，那一種情形可以原有？例如：縣市長

特支費規定均為一萬元，大如臺北市與小如臺東縣，同等待遇；實際上，臺北市絕不够用，乃由附屬機構分攤列報，這是違法而不舞弊。如果以臺北市特支費開支不當為藉口，對於某同志不滿，是「不公道的」。我慷慨陳辭，結果仍核定某同志競選連任。（二）基隆市長選舉，我所提薦的是當時任市黨部主委的某同志，與黨外人士林番王競選。某同志不幸落選，我即引咎辭職，但未蒙領袖核准。他老人家，並在中央黨部會議席上，指示我們：「真民主有勝有敗，不能全勝。臺灣二十個縣市，失去一個單位，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勝利。譬如軍隊作戰，勝負無常，指揮官豈能每個戰場都獲勝利！」（三）高雄市長選舉，黨外的楊金虎每次都參加，且勢在必得。本黨在南部很爭人望的某同志，公認是最適當人選，但是他堅不願就，並以「要侍奉年高的母親」為由而婉拒。正好 領袖那時駐節高雄市西子灣，我即趕往晉謁，報告高雄選情。 領袖立允寫封信給某同志，並說：「信寫好了，你帶去好不好？」我答：「最好請官邸直接送去，使某同志知道這是領袖的徵召。如由我送去，他一定以為是我報告，懇求 總裁寫的。」我又建議最好召見某同志一次，也蒙 領袖俯允。後來某同志乃出而競選，卒贏得勝利。

## 服務處站得以保存

健全基層組織，是省黨部中心工作之一。現在各鄉鎮的民衆服務處，站，就是我當年所創設

的黨的基層組織。設立之後，曾遭受黨外所謂自由民主人士的抨擊，少數不明真相的黨內同志，也隨聲附和，因此引起它的存廢問題。中央常會討論黨的基層組織與活動方式問題時，竟有黨內一二極重要人士，因受外間批評中傷的影響，而主張撤銷民衆服務處站，我當即起而辯明：「我並不否認黨的基層幹部有許多不健全的，黨的基層組織也有許多的缺失。但是，不健全的幹部，可以調整，組織的缺點，也可以改善，豈能因噎廢食？如果撤銷民衆服務處、站，黨就變成了沙灘上的建築，有如空中樓閣。」我據理力爭，繼續舉例說：「今天也有人攻擊警察，我們是否裁撤警察？攻擊稅務，是否取消稅務機關？攻擊司法，是否就關閉法院？這是同一樣的理由。」我並非固執己見，偏愛我所創設的基層組織，而是確認它有存在的必要。當時領袖以爲這番話，不無道理，乃裁定對於撤銷之議，不予考慮。足證領袖英明，處事高瞻遠矚，洞察是非，而不遷就人事，犧牲原則。

我再度服務省黨部期間，尚有件事值得一提，省黨部遷臺中後，民國五十年四月三十日首次，在臺中市召開代表大會，簽報領袖，大會代表擬北上聆訓。後來侍衛長吳順明將軍轉達指示：領袖說：他應遷就多數人，要親自到臺中來。當時，省黨部遷往臺中不久，新的辦公大廈尙未建築完成，係臨時借用臺中市的中山堂辦公，附近違章建築多，環境衛生壞，而且警衛也不便。領袖要親蒞大會訓示，我建議借用中興新村的中興會堂或清泉崗裝甲兵司令部禮堂。吳侍衛長又

奉命傳諭：「省黨部代表大會在什麼地方開，我就到什麼地方講話；其他的事不要顧慮太多。」因此那一次代表大會，領袖專機飛到臺中後，就在破舊的中山堂訓話，連一小時之久，情詞懇切，諄諄訓勉，全體代表於聆訓後，均極感奮。這次代表大會，我個人尤其感到榮幸，當我隨侍領袖左右時，他老人家忽然對我說：「你到省黨部很辛苦，我們來拍張照片留念。」這幀最珍貴的合影，我加印了數張，分別恭懸於辦公室、書房和客廳，俾能每日瞻仰，時懷教澤，而知有所感奮自勵。

### 創辦市專亦蒙關注

我離開省黨部後，鑒於臺灣都市人口不斷增加，都市建設工作日趨繁雜，乃倡議創辦一所市政學院，以培養市政建設專門人才。適政府教育政策變更，限制大學與學院之增設；五十四年乃改辦私立中國市政專科學校；至五十七年，因學校已頗具規模，曾兩度簽報領袖，請求改爲市政學院，並蒙傳見垂詢詳情，認市政建設和市政人才的培養甚爲重要，至於學校是否適時改制，則批交總統府張秘書長岳公（羣）核辦。嗣蒙岳公與教育部研商後，以目前政府限制增設大學、學院係屬通案，牽涉問題甚多，希望暫時不提改制問題。後來，我又曾申復一次，總裁仍批交張秘書長核辦。復蒙岳公約談，備加勉勵，改制之事，遂爾擱置。如今中國市專創校已十六周年，十六年來，在全校師生共同努力之下，無論校舍建築、教學設備、師資水準及學校學風等，均

有很大的發展與進步。今後，我將以畢生精力，來辦好這一所學校，爲國家社會，培植一些優秀的市政建設人才，以報答領袖對個人的培育深恩，以及對我市政專校關注的德意。

### 四點體驗無限感念

我効忠領袖四十餘年，在我的體認中，他老人家所垂示的道範實在高不可仰，但有下列四點，最令人特別值得崇敬和仰慕。

一、平凡中自然偉大 領袖畢生盡瘁國事，爲革命導師、民族救星、國家元首和世紀巨人，其對國家民族及人類和平所作之偉大貢獻，在歷史上是空前的，故逝世後，全民震悼，舉世同悲。但領袖生前的日常生活，在衣食住行各方面，却簡樸如常人，其待人接物，尤極平易近人，凡隨侍過領袖的人，都具同樣的感受。惟在平凡之中却蘊藉着精深的精神修養和顯現出偉大的人格來，如仁民愛物、大公至正、莊敬自強、處變不驚、冒險犯難、堅毅不拔等崇高的精神。領袖一生最重視精神修養。我們不難從他老人家於今總統經國先生四十、五十、六十歲生日時，曾親題「寓理帥氣」、「主敬立極」、「精一執中」等字軸以贈一事窺知。這十二個字是我國數千年聖哲相傳的道統精義所在。也完全在領袖日常生活中，自然具體顯示出來，所以說，他老人家是「平凡中自然偉大」。

二、慈祥中自然威嚴 我們敬愛的領袖蔣公，是一位大仁、大智、大勇的聖哲，他老人家平日待人接物，特別慈祥和藹，視部屬學生如

同子弟，督導其工作，關懷其生活，並教誨他們做人的道理與治學的方法，大家都如坐春風，如霑化雨，而欣然景從，効死勿去。我自己就是親炙教益，沐受厚恩的人。例如：我從大陸脫險後，撥款囑我接眷來臺；我兩次出國辭行時，一次厚賜旅費，一次垂詢鼻疾等。不過領袖在慈祥中，却自然具有一種浩然正氣的威嚴，常令人產生敬畏的心理。他態度莊重，目光炯炯，甚至有人在瞥見時，顯得心情緊張，坐立不安。我們如今一想到領袖的音容笑貌，仍不禁肅然起敬。所以說他老人家是「慈祥中自然威嚴」。

三、苦學力行中自然博大精深 領袖九歲時就開始與王太夫人過着孤苦伶仃的生活；在青年時代，即追隨國父，獻身革命，東奔西走，致力救國救民的艱鉅工作；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時間，並不大長，他之所以學貫中西，道通天人，成為偉人聖哲，雖屬睿智天縱，但仍由於他自己的苦學力行，有以致之。領袖自幼就養成好學的習慣，平日對於軍事、政治、哲學、宗教各方面的學問，無不加以精研，縱然軍書旁午，及身處危難之中，仍然手不釋卷與從事著述。如民國十一年，國父廣州蒙難時，曾著「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」一書，民國廿五年西安事變時，曾著「西安半月記」等。領袖的好學精神，我們可以說：是「老而彌篤」。這一點可從五十九年四月十四日，他老人家從日月潭祝賀經國先生五十晉九壽誕的手書中看出，這封手書所談的，全是研究學問之事，而不及其他。領袖博大精深的學養，一方面，固由其一生喜歡博覽羣書的好學精

神，但另一方面，則係從實際工作中體驗得來。因此，他倡導「力行哲學」，勉勵大家從實際工作中去學習。領袖一生為革命犧牲，為主義奮鬥，經過了無數艱難險阻，而意志堅定，化險為夷。這種大無畏的精神，如果不是從苦學力行中，獲致博大精深的學養，曷克臻此！

四、冒險犯難中自然克享遐齡 領袖畢生致力國民革命，可說無時不生活在出生入死、冒險犯難之中，但他始終抱着「不成功，即成仁」的決心，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」，從不顧及自己的安危。如國父廣州蒙難時，他隻身赴難，苦撐危局；西安事變，身處危難之中，大義凜然，不為勢屈。在北伐、剿匪、抗戰、戡亂各戰役中，

領袖常以最高統帥之尊，親臨前線，指揮作戰。他曾說：「貪生不得生，求死未必死。」、「只見一義，不見生死」、「我死則國生，我生則國死」。他老人家認為最危險的地方，最為安全。故一生履險如夷，最後在病中，猶手書「以國家興亡為己任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」十六字，交付經國先生保存。恭讀遺墨，更增懷念與景仰。宋儒張載有言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這四句話，正好是我們偉大領袖一生的寫照。孔子說：「智者不惑」、「仁者不憂」、「勇者不懼」，領袖雖在冒險犯難之中，却始終秉持不惑、不憂、不懼的最高修養，自然可以化險為夷，克享遐齡。

#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著

上下冊合售一二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上冊60元下冊70元合售一二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